

习近平经济思想中五个 “必须统筹” 论述与 “两个结合” *

裴长洪 彭 磊

【提 要】对国民经济运行进行管理和调控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党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五个“必须统筹”的指导思想，其中蕴含的五对矛盾和统筹思想，是党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进程中，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总结和提炼。习近平经济思想对这些矛盾认识的系统集成和理论概括，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统筹兼顾”思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始终坚持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历程，到经济工作的具体安排落实，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思想来源。从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史看，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新生产力与传统生产的关系、小农经营中做优经济增量与盘活经济存量的关系、提升经济质量与做大经济总量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等重大经济关系方面，我国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并形成了重要的思想观点，因此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民族根脉与文脉。

【关 键 词】习近平经济思想 五个“必须统筹” “两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0

【作 者 信 息】裴长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100836；彭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00836。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实践中，我们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经济工作千头万绪，必须统筹好几对重要关系。”一是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二是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三是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四是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五是必须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大国博弈的物质基础。^①五个“必须统筹”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调控的规律性揭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最新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的理论进展，需要认真研究和阐释。

一、五个“必须统筹”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中，如何进行国民经济运行的管理和调控，是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重要内容。2012 年以后，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工作的总基调成为国民经济调控的指导原则。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②“稳中求进”虽然不是在党的十八大上首次提出的，却是在十八大之后党长期坚持的经济工作原则，事实上已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如何实现稳中求进，需要哪些政策组合，是探索经济工作规律的另一重要认识。在多年实践中，每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在不断完善对中国经济运行调控的多元目标政策组合，形成了宏观政策、微观政策、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八项政策组合，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关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鲜明特色。^③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国经济也受到影响和冲击，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俄乌冲突发生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党的二十大之后，

①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年，第 556 ~ 557 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32 页。

③ 参见裴长洪：《习近平经济思想理论内涵研究述要》，《经济研究》2024 年第 2 期。

经济工作进入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成为经济工作运筹与调控的新挑战与新课题。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六对矛盾，提出了“六个统筹”^①。为进一步破解经济运行的诸多矛盾，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视察中首次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任务。此后，经济运行中培育新动能和旧动能转换成为国内经济运行的常态现象。同时，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三个统筹”^②。统筹兼顾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工作原则，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科学方法论，其哲学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核心要义在于总揽全局、协调平衡、重点突破、点面结合。统筹，注重的是总揽全局、通盘谋划；兼顾，注重的是协调平衡、系统联动。统筹兼顾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工作方法，既强调综合平衡，避免畸轻畸重、以偏概全，也强调突出重点，以点带面，避免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年代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方法解决各种矛盾问题。毛泽东很早就针对党的工作方法提出了要学会“弹钢琴”，就是强调统筹兼顾的工作方式。^③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统筹兼顾上升到科学方法论高度，着重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正确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关系”。^④

“六个统筹”和“三个统筹”的概括，反映了对当时经济社会形势及任务的正确研判，对照当下，有必要作出与时俱进的发展。例如，有的论述更加针对当时的主要问题，已经滞后于经济现实，如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的没

① “六个统筹”指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更好统筹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好统筹当前和长远。

② “三个统筹”指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2页。

④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有反映经济运行的最新矛盾，如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内需转弱问题；有的不属于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如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主要反映的是指导方针层面的关系。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个“必须统筹”，是我国经济运行实践的最新认识和总结，它所提出的五对矛盾是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目标进程中经济运行的常态化矛盾，抓住这些矛盾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和理论概括，具备精准性和科学性，反映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可以说，五个“必须统筹”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的科学内涵。

第一，体现了观察事物和把握问题的系统观念。五个“必须统筹”所反映的经济运行中的五对矛盾是经济运行常态化的整体现象，以往对其中的若干矛盾也曾有深刻的认识，但把五个矛盾放在一起分析和观察，就有了系统集成和整体把握，可以避免顾此失彼，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恩格斯认为，“关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联系中的认识，推动科学到处从个别部分和整体上去证明这种系统联系”。^① 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也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因此要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② 经济系统是中国式现代化大系统中的关键部分，必须用系统观念认识和处理经济循环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客观要求。五个“必须统筹”体现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系统集成、统筹兼顾的要求，就是总体上对这一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运用和发展。另外，近年来，党中央在经济工作中先后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扩大内需战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战略等一系列改革任务，目标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当前阶段，把这些任务系统归纳为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不再孤立看待每一项改革任务，而是强调其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系统联系，目标是协同推进、精准化解国民经济循环不畅通的矛盾。当前阶段，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是主要任务，把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相结合作为化解主要矛盾的方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40 页。

②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

兼顾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其经济含义是，未来经济工作必须把提升质量作为化解矛盾的主要方面，并进一步将其与把“蛋糕”做大的次要矛盾化解兼顾起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才牢固。

概括起来说，我国经济运行将始终面临“放活”与“管住”、总供给与总需求、新旧动能转换、增量与存量、质量与总量这五对矛盾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紧密联系、互相交织，构成国民经济运行整体系统的内在机理，牢牢把握住这五对矛盾关系，统筹兼顾，就可以掌握宏观调控和管理的主动权。

第二，体现了对事物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客观性，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是党的基本经验。毛泽东指出，“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①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改善供给结构，增强供需适配性是主要矛盾。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就指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②因而，扩大经济增量和提高经济质量必然成为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但是，抓住主要矛盾不等于可以忽略次要矛盾或放弃次要矛盾，而且有时候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毛泽东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③疫情结束后，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但结构显著变化的状态已经过去；新质生产力发展活跃，但旧动能仍然居于经济活动的主导地位；经济增量年年有，但经济存量调整的空间仍然很大；经济质量年年提高，但扩大总量的意义仍很重要。因此，仍然需要在需求侧方面进行总量调控加以配合，仍然要注重增强传统动能的活力；仍然要关注经济存量的调整和经济总量的扩大。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讲两点论，也要讲重点论，还要关注矛盾运动的转化，认识和把握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这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方法论。五个“必须统筹”深刻体现了对我国经济运行变化的规律性认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4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2017年，第9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第332页。

第三,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以全体人民(包括国内外一切可转化因素)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在不断保障和提高人民群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动性和能力的基础上,调动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经济组织以及各类社会资本的积极性,统筹协调、全面平衡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各种利益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完整和准确体现。因此,“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就是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市场和政府“两手抓”,提高对各类资本的驾驭能力,以正确处理“人民”和“资本”的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资本理论认识的全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逻辑首先应当是人的逻辑,而不是资本的逻辑。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它的目标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剩余价值和资本利益最大化为中心的立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①因此,资本属性是由外在生产关系所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②实质阐释了资本主体的所有者性质以及所处生产关系对资本的属性约束关系,表明资本的可塑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诚信文化,教育引导资本主体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信用信义、重社会责任,走人间正道”。^③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和有效提高驾驭各类资本的能力,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各类社会关系矛盾。毛泽东指出,解决各种矛盾的方针就是,“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④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它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集团组成的集合体,在其内部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其中经济利益矛盾是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是指海内外一切支持、拥护、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包括民营企业创业人员在内的新

① 《资本论》(纪念版)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922 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人民日报》2022 年 5 月 1 日。

③ 同上。

④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28 页。

的社会阶层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① 因此，无论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还是民营资本，其资本主体本质上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都是各阶层人民的一分子，对其经济行为都需要予以规范和引导。问题关键是要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平衡各阶层人民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这是构建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一手通过有效市场激发全社会全体人民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活力；另一手通过有为政府积极调节各阶层人民间经济利益冲突，使各类资本主体所掌握的资本变得“文明”和“耐心”，最大限度增加全体人民群众的福祉。

第四，体现了以发展实体经济为着力点的内在要求和经济规律。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潜力在于新质生产力不断壮大，这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保障。但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盘仍然是传统产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② 而无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提升传统产能，无论是增加新供给还是保持供需适配性，无论是扩大经济增量、提高质量还是调整经济存量、扩大经济总量，都必须实现社会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统一增长。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广大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极大满足，即大力发展实体经济。这既是对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的全面理解，也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立场的具体实践要求。马克思有关社会两大部类生产循环理论，揭示了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增值规律，即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创造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增值部分，只能在交换和流通过程中予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经济循环中，追求价值财富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必然趋势，因此资产阶级积极开拓世界市场，使生产和交换流通环节彼此分离，这是西方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崇“全球价值链”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产生脱实向虚的内在原因。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夯实物质基础，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脱离物质生产，单纯为价值增值服务的虚拟经济活动，只能为少数资本主体牟利，最终会脱离并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背道而驰。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并指出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的客观必然性，揭示了单纯以劳动和资本要素

①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4年12月13日。

驱动的生产发展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化大生产需要自觉地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把发展生产的着力点更多地转向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培育新质生产力，是发展实体经济、实现兼顾物质财富和价值财富统一增长的有效途径。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① 科技创新催生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通过不断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不断提高供需适配性，不断在调整经济存量中优化资源配置，扩大经济增量；不断在提高经济质量中扩大经济总量，实现使用价值创造与价值财富同步增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五个“必须统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创新发展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工作规律的探索，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统筹兼顾”的原则是一以贯之、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大到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小到经济工作的具体安排落实，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个原则。这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突出特点。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总结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② 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他回答说：“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③ 这个方针的深层逻辑就是正确处理社会利益关系问题。新中国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即从做大“蛋糕”的出发点来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这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逻辑显然有本质区别。毛泽东在 1956 年 4 月和 5 月接连强调，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伟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2 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999 年，第 228 页。

③ 同上。

大事业，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之奋斗，因此需要处理好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团结力量，这是毛泽东提出要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出发点，也是他写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动机。^①

十大关系包括经济各主要部门的关系、区域经济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等。毛泽东说：“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②可见，他重点讨论的是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的背后涉及的都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问题，为了调动全体人民的积极性，需要协调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之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分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这三大群体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包括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实质上都包含经济利益的矛盾。对于这些利益矛盾，毛泽东提出了统筹安排解决思路，要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的利益。“统筹兼顾”思想是毛泽东提出的协调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关系的基本原则。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党的一贯主张进一步得到贯彻落实，并且有新的重大认识飞跃和创新发展。在新的历史阶段，如何更积极地、更科学地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新课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被打破，社会阶层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群体类别增多，不同的利益诉求增加，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增加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成为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关系的重要原因。面对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利用统筹协调方法，强调“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③破解经济社会建设面临的各种复杂矛盾，调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

① 毛泽东1956年4月和5月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讲话。

②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1999年，第37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5页。

统筹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改革开放初期贯彻统筹兼顾原则的首要问题。党中央统筹“两个大局”，对沿海与内地共同发展和相互支持作出战略安排。一方面，“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方面，“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① 针对改革开放之后沿海与内地富裕程度的不平衡，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先富帮后富是一个大局问题，明确要求先富裕起来的沿海地区有责任支持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他对深圳市每年从财政资金中划出一部分支持贫困地区搞生产开发的做法表示赞赏。此后他念念不忘此事，曾与身边人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②

统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是在沿海地区先富起来后贯彻统筹兼顾原则面临的紧迫的实践课题。1984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上级国家机关组织和支持对口支援的职能和要求，为对口支援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1994 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并部署了进一步的对口援藏工作。各地的援藏工作由最初的提供资金、物资、人力的“输血式”支援，发展为以人才培养、技能培训为主要方式的智力支援，再提升到大项目落地、带动产业发展的“造血式”支援，为统筹内地与新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经验，创造了新模式。1996 年 5 月，中央确定北京、天津、福建等东部 9 省（市）和深圳、宁波、青岛、大连 4 个计划单列市与西部 10 个省（区、市）开展扶贫协作；同年 9 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作出部署，开启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历史性大幕，加快西部贫困地区扶贫开发进程、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迈出了新步伐。

这些统筹兼顾原则的实施举措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区域发展战略。1995 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7～278 页。

② 参见 1993 年 9 月 16 日邓小平与弟弟邓垦的谈话，《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年。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国家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并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初步设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2003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全面阐述了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战略意义，明确了这些地区的发展目标。同年12月，国务院成立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2006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2007年1月，国务院明确中部地区26个地级以上城市比照执行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243个县（市、区）比照执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同年4月，国务院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成立。2009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对2009—2015年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作出全面部署。总之，一方面，国家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在改革开放中先行先试，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强东、中、西部经济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统筹兼顾原则在协调人民内部利益关系中的广泛实施，形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来源。党的十六大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协调归纳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实现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并首次把生态和谐问题提升至国家发展的全局高度。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对社会和谐认识的深化，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列为党必须加强的六大执政能力之一。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其目标和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收入分配合理有序，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人民更加富足；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与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良

好社会秩序进一步形成；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阶段，我国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与之前的高速增长时期相比，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影响国民经济畅通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不同地理空间居民的利益协调关系逐步转入国民经济内部经济变量的协调关系方面，需要根据各种情况的变化来平衡每年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的关系。在这些新的实践面前，探索新时期国民经济运行规律和国家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论，就成为党的十八大之后党的经济理论创新面临的新课题，如何回应这些问题，也成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体系中关于国民经济运筹与调控思想的问题导向。首先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这不仅是国民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也是平衡协调国民经济各种变量关系的必要条件。在这种前提下，不断完善的八项政策组合，是从平衡协调人民内部不同群体利益关系转向平衡协调各种经济变量关系的探索和过渡。特别是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后，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以及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更大程度上更直接地通过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经济变量的变化反映出来，因此，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六个统筹”，标志着畅通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着力点已经转向协调国民经济内部的经济变量关系方面，从而初步形成了新形势下国民经济运行调控的方法论。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五个“必须统筹”，进一步校正了国民经济运行的变量关系，找准了平衡协调畅通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完善了国民经济运行调控的科学方法论，从而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理论与最新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发展。

三、五个“必须统筹”是中华经济思想 文明与实践的创造性转化

受朴素唯物主义传统和朴实辩证法观念的影响，中华文化历来强调系统协调、和谐中和。系统协调观念是强调事物整体的关联性和协调性，意味着整体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之间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而不同事物之间则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映照。中华文化这种系统联系体现在《周易》《老子》《庄子》《管子》《黄帝内经》等经典文献阐释的“阴阳”“五行”“八卦”“象数”“经络”“天人感应”等诸多概念中，形成中国古代哲学有关系统性、协调性、复杂性等

独特观念和思维方式。和谐中和观念强调人的内心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最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尚书·尧典》中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思是，尧帝彰显自己崇高德行，使家族和睦；然后公正治理百姓，使百姓和睦相处，实现社会和谐；在此基础上，通过协调各邦国的利益，使各邦国间相互和睦，和谐协作。这一社会政治理想突出“和”字，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古代圣贤实践“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天下观，在于“中和”。《礼记·中庸》中说：一旦达到“中和”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万物便生长繁育。这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实践的原则；“和”之“达道”，不断激励中国人追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衷共济”“天下和美”等特色鲜明的最高社会政治理想。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是探讨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的关键是“治国平天下”的“平”，也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因此，中国政治文化很早就有社会利益关系协调的命题。唐太宗李世民总结“载舟覆舟”的教训，实行均田制，开创贞观之治；北宋名相范仲淹号召知识精英“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①；历代王朝的明君贤相都推崇“轻徭薄赋”，以协调王朝国家与农、工、商的利益关系；主张抑制土地兼并以协调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利益关系。所以，中国不缺乏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国家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遗产。

当然，当代的经济实践要比古代经济活动复杂得多，当代经济思想和理论也比古代更有深度、更加完整。而今天我们的经济思想强调继承性和民族性，强调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并非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再版和复制，因此不能苛求古代的实践认识与现代事物的相似度和拟合度。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今的意义在于认识论方面的启发，而不是提供现成的答案。就像《孙子兵法》，即便在体系化作战的现代战争形态下，我们也不能否定它的军事科学理论意义，是因为它揭示了古代战争的底层逻辑，尽管古代战争形态与现代战争迥然不同，但其揭示的底层逻辑与现代战争规律仍然具有关联性，仍然是今天我们认识现代战争规律的思想来源。因此，我们今天说的理论创新要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寻找中华实践与认识的文明基因与现代事物的关联性，并且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解释它、转化它，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创新性实践和认识的文明来源。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五个“必须统筹”在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和认识中是可以找到关联性的，其中蕴含的中华文明基因，显示出这个创新理论所具备的继承性和民族性。

^①（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古文观止》，崇文书局，2020年，第202页。

第一，市场是经济活动最主要、最直接的驱动力，而政府干预又是改变经济变量关系的最有力手段，因此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协调平衡的首要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认识经济变量的关系，也是从市场力量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入手的。司马迁的“善因论”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关于市场自由主义学说的代表。“善因论”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① 他直接阐明了民众对物欲和利益的追求：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享受音乐和美食，使口中尽可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物质享受和精神愉悦的风气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久了，即使用古代先贤的言论劝说他们，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因此（君王对于民众）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用利益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民争利，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② 这体现了司马迁朴素的自由市场经济观，主张放任社会经济的自然发展，反对“与民争利”；在这个环境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③ 市场力量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不待召唤，财物就会顺时而至，无须征求，百姓们自己就会把货物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证明的吗？《管子》的“轻重论”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主张政府管控经济的代表性理论。它主张政府管制经济，对商业活动进行干预，实行“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④ 主张把社会财富的予、夺权力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才能“调通民利”，实现国家大治。同时，“轻重论”以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政府管控的另一目标。因此，“轻重论”成为历代封建国家财政官员的理论武器。现代学者常把管仲学派的“轻重论”类比为当代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轻重论”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核心思想是调控商品的市场价格，它论证了商品的市场价格与货币之间的矛盾关系，“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⑤ 主张由政府铸造货币并垄断货币发行，即“人君铸钱立币”，使货币发行服务于国家财政和经济的需

① （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第 3256 页。

② 同上，第 3253 页。

③ 同上，第 3254 页。

④ 《管子·国蓄》，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262 页。

⑤ 《管子·山至数》，黎翔凤：《管子校注》，2004 年，第 1342 页。

要；它还强调“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①通过改变货币同其他商品之间的轻重关系来影响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实施对经济的管控。

然而，“轻重论”和“善因论”并非完全对立，前者并非否定市场的作用，而后者也不是完全抵制政府干预，二者的差异在于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轻重论”偏重在流通领域实行由政府对市场的管控；“善因论”在生产领域主张“重农”，即强调政府要干预农业生产，但对于市场流通应采取放任政策。二者差异的根源在于出发点不同。“轻重论”立足于王朝利益，将政府有序维持经济秩序放在首位，主张国家管控经济、发展国家资本，“富国第一”；“善因论”则立足于市场中的个人利益，将商品经济发展的活力置于首位，主张鼓励市场竞争、发展民间资本，“富民第一”。这二者的不同侧重点恰恰成为今天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构建对立统一理论的文明基因来源。这两种思潮均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国历代特定时期所处的政治经济态势往往决定了这一时期政府与市场的大体边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既主张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又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对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关于市场和政府对立统一关系的继承和发展。而且，在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

第二，在经济运行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是经济变量中最常态化的矛盾现象。供给创造需求，而需求也反过来刺激供给。经济政策既要关注供给侧，同时也不能忽略需求侧，因此需要统筹这对矛盾，既要抓住主要矛盾，也不能忽略次要矛盾，并时刻关注主次矛盾的相互转化。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当然不可能有“供给”“需求”这样的现代经济学术语，但是反映这种关系的思想以及处理这种矛盾的经济政策却不鲜见。例如，先秦法家李悝（约公元前450—约前390年）强调重农，认为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伤则国贫”。^②所以，“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③这些观点反映了李悝对供给侧的重视。而在需求方面，为了稳定粮食价格，李悝又提出了平籴政策，^④所以李悝的经济思想是将供给侧和需求侧结合起来。不过，中国古代经济

① 《管子·国蓄》，黎翔凤：《管子校注》，2004年，第1259页。

② （汉）班固：《汉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124页。

③ 同上。

④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年，第107页。

思想的主流是重视农业生产，强调供给，认为农业是生产财富的主要来源，而工商业不生产财富所以必须予以抑制。荀子认为，“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①我国古代长期坚持重农抑商政策，同时主张“黜奢崇俭”，它不仅为儒家所尊崇，其他诸子百家也多认为节俭既是一种美德，也是理性的选择。比如，道家认为节俭能减少对大自然的耗费，老子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与经济有关的思想是无欲和知足；墨家主张节用，并将其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墨子曾告诫统治者“俭节则昌，淫佚则亡”。^②

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经济中的需求结构有紧密关系。从秦汉至唐代中期，封建国家通过贡赋收入占有了绝大部分的社会剩余产品，巨额贡赋收入形成庞大有效需求，拉动分工生产和商品经济，主要是满足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消费，而在劳动力和资源配置方面形成对农业生产的挤压。重农抑商政策和主张“黜奢崇俭”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其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唐宋以后，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在社会剩余产品中的比重上升，封建国家贡赋收入比重下降，儒家知识分子的主张逐渐从“黜奢崇俭”转向等级消费，其理论依据就是胡寄窗先生所概括的儒家消费观“俭不违礼，用不伤义”，^③它极大地影响了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

尽管强调供给侧在中国经济思想中占据主导，但论述需求的意义以及主张的政策也不少。如战国时期齐桓公问管子：“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说：“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④意思是这固然有意义，但并不够。管子以纪国粮食多而外流为例说明需求管理的重要，治国者要做到“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⑤就是说不能片面强调生产而不顾需求，而生产和需求要根据各国市场变化随时调整。根据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管子甚至提出了“适度奢侈”的消费主张，“不侈，本事不得立”，^⑥即不把“侈”这个需求释放出来，不仅工商业得不到发展，而且连农业这个“本”也难保。所以“侈”的消费既有享乐一面，也有创造就业机会的另一面。

①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年，第98、99页。

② 《墨子·辞过》，孙诒让：《墨子问诂》下，中华书局，2001年，第38页。

③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1997年，第47页。

④ 《管子·轻重乙》，黎翔凤：《管子校注》，2004年，第1453页。

⑤ 同上。

⑥ 《管子·侈靡》，黎翔凤：《管子校注》，2004年，第703页。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工农劳动者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显露，思想家开始质疑“黜奢崇俭”的经济伦理。明代思想家陆楫曾说，“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不易为生者也”，又说，“吾未见奢之足以贫天下也，自一人言之，一人俭则一人或可免于贫；自一家言之，一家俭则一家或可免于贫。至于统论天下之势则不然”。^① 换句话说，一个家庭可以坚持“勤俭持家”而免于贫困，但作为社会伦理和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原则却不是如此。明代另一位思想家李贽提出了“奢俭俱非”^② 的看法，他认为奢侈是不对的，但是只强调整俭也有问题，不释放需求就不能刺激生产和挖掘经济的潜力。到了近代，经济思想家越来越意识到抑制大众的合理需求所带来的弊端，魏源、谭嗣同等人都对儒家“崇俭”的经济伦理进行了评论和修正，对大众消费释放需求提出了许多创新的观点。可见，关于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讨论在我国经济思想中源远流长，今天我们讨论的统筹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也是中华千年文脉的延续和发展。

第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各变量关系中，新旧动能此消彼长是经济变化中最突出、最重要的现象。要使新质生产力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仍然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统筹新旧动能关系的思想和政策是尤为重要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当然也不可能用今天的术语来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古代的经济实践却明显地诠释了这一辩证发展关系。中国的古代经济史，其实主要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其中粮食生产发展史就是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变化的历史，其实践经验弥足珍贵。中国古代生产力新旧动能的转换主要是通过三次粮食品种的引进推广实现的。以现代科学技术的眼光看，一种新的粮食品种的出现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新的生物技术的运用，并由此引起了作物栽培技术的变革，带动了农田水利技术的发展。在中国，水稻品种的大面积生产，引起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工程以及农田建设工程，引起了农具的适应性变革以及畜力的变革（南方水田需要水牛），引起了作物收割储存条件和技术的革新。它使生产力中的各要素——生产对象、生产工具——都发生了新变化，形成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新生产力和新动能。

粟、黍和菽（即谷子、黄米和大豆）是先秦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农作物。这三种农作物生长所需的生态环境与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具有共同特征，在中华民族先民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这些耐旱耐贫瘠、生长期又比较短的作物不仅十分

① （明）陆楫：《菴葭堂杂著摘抄》，中华书局，1975年。

② （明）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91页。

适合当时中国北方旱地种植，而且适合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因此，这三种作物率先被我国先民选出来作为当时的主要食物。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人口增长往往受制于粮食作物的产量，产量不高的农作物难以持续支撑人口增长的需求。于是，遥远的西亚小麦开始被引入中国。商、周时代，小麦的地位并不高。到了战国时期，小麦开始取代粟成为各国粮仓的主角，这个转换过程历经几百年。秦末动荡之后，汉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关中平原上大力推广小麦种植。“文景之治”盛世的形成，与全国范围内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大与产量的提高显然密切相关。

中国古代农业第二次新旧动能的转换发生在小麦与稻米之间。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当时太湖流域以及杭州湾地区的原住民就有种植水稻的记录。但当时稻谷更多用来做酒，不是主要的充饥食物。即使后来人口增长了，稻米作为粮食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提升，原因是水稻种植需要一定的栽培技术，而我国古代迟迟没有在水稻产量和种植周期上取得较大的突破。唐宋之后，北方耕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达到天花板，小麦产量难以大幅度提高。北宋初年，来自越南的占城稻品种成为中国粮食生产的新动能。占城稻品种具有高产、早熟、耐旱等特点，从种到收只需要两个月时间。占城稻由泉州商人从东南亚引入福建等地后，迅速在长江流域得到推广。由于占城稻生长周期短，后来人们发现可以在农田里采用水稻、小麦轮种，这样单位亩产大大增加，还减少了休耕的次数。优质稻种的引入和推广，直接激发宋朝时期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增长。特别是南方地区人口增长更多，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

中国第三次粮食生产新旧动能的转换发生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即明朝后期和清朝初期。虽然占城稻的引进使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宋朝首次突破了 1 亿大关，但自那之后中国人口就进入了缓慢增长的时期。即便是在明清疆域版图大幅扩大的情况下，人口也不过在 1.5 亿左右。究其原因，粮食产量是供养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新开垦的农田很有限，在技术没有提高的条件下，粮食产量已经达到极限。明代中后期禁海令废除后，对外贸易尤其是民间贸易日盛。加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许多新大陆的物种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原产于南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番薯就是在这时期传入中国的。这些作物普遍具有耐旱且高产的特点，能在较恶劣的条件下生长，可以在山地、丘陵等复杂贫瘠的土地上种植，不占用平原耕地。新的粮食农作物的引进和推广，配合小麦、水稻的耕作，共同充实了康乾时期的粮仓。中国人口数量从清朝初期的 1 亿多急剧增长到清朝中期的 3 亿多。由上述可见，在中国几千年经济发展历程中，生产力的革命不断发生，生产技术的

革新不断催生经济中新旧动能的转换，但每个转换过程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周期，无论在农业劳动者的生产实践中还是在社会统治阶级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中，都需要考虑农作物耕种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生产技术条件，需要因地制宜地种植引进的农作物。中华农耕文明对现代经济中新旧动能转换的把握协调具有启示作用，成为我们今天统筹经济活动中各种变量关系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第四，协调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优化资源配置，是现代经济理论揭示的规律。在今天，经济增量主要靠新的投资实现，做优增量的主要实践就是提高投资效率，使经济增量达到优质高效。经济存量主要是指以往投资已经形成的资产以及投入运行的资金，但如何提高这部分存量的运行效率，往往在实践中被忽略，这是我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个短板，需要加以改进。而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中国古代的小农经营是 19 世纪初期之前中国经济登上世界巅峰的微观经济基础，其基本的实践经验就是不断盘活存量。在中国古代农业中，土地和劳动力是两个最基本的经济资源，这两种生产要素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增长，其增长具有代际性，因此中国传统经济的增长并不主要依靠新增投入的增长，而是主要依靠经济资源存量的盘活和高效利用。

自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和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实施“废井田，开阡陌”之后，小农经营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主要经营形式。到明清以后，地主租佃制日趋成熟，甚至出现了“永佃权”现象，封建国家的赋税制度、劳役制度日益货币化，农民配置资源（包括家庭劳动力资源和部分土地资源）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为农业生产盘活存量、优化资源配置创造了制度条件。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是中国小农经营提高效率的传统。先秦法家李悝强调“尽地力之教”，“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①那个时代正常年份的每亩产量为“一石半”，而劳动的勤谨与否，可使亩产相差六斗之多，可见劳动力密集的精细农业思想及其实践是中国经济盘活存量的重要传统。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体系中，私有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主要的两种生产要素，要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最有效的做法是促使两者紧密结合，并采取各种措施分别提高这两种要素的使用效率。所谓“治田勤谨”，就是充分使用地力，同时种植多种作物，以防单一种植时作物因自然灾害遭受损失。这种农业经营思想对我国古代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轮作倒茬、间作套种、多熟种植、喜阴与喜阳植物搭配种植，稻鱼共生、猪沼鱼、立体养殖等农业种植和经营模式的形成，大大优化了农业资源的配置。

^①（汉）班固：《汉书》第一册，1962 年，第 1124 页。

发展精细农业是内涵式的盘活存量，而发展多种经营和手工业是外延式盘活经济存量资源的结果。外延式的盘活存量就是使土地和劳动力的使用有更广阔的空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长期问题是小农经营的土地碎片化问题，特别是在长江以南的丘陵地带更为严重。但是在私有土地之外还有许多山地、湖泽等非私有的自然资源，加之中国南北方的生物多样性，创造了多样化产出的条件。在山地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业，促进了家庭纺织业的发展，妇女劳动力得以充分利用；在山地种植茶树，发展了茶叶加工和运输业，茶叶成为政府专卖产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财政收入。此外还有甘蔗、花生、蓝靛、漆、蜡等农产品及其副产品的生产，支撑了与此相关的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的延伸和发展，不仅扩大了商品生产和市场，而且成为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向。在各种家庭手工业基础上，作坊手工业发展起来。明末宋应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共3卷18篇，收录了农业、纺织、染色、机械、陶瓷、造纸、兵器、火药、制盐、采煤、榨油、酿酒等30多个行业，130多项生产技术。^①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赞扬《天工开物》是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充分利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持续优化调整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的领域和产业，不断开拓劳动力资源使用空间的生产实践，产生了清朝初期的“治生之学”，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的微观经济学。“治生之学”的代表人物张履祥是熟习“田家纤悉之务”的理学家，其学问的主要内容是“抚御佃户”之道和如何经营自己的田产，^②实际上就是如何把劳动力与土地更好地结合、如何把劳动力资源用到极致。可见，这个学问体现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后世影响更大的是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共60卷，50余万字，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门。这部著作实质是关于农业经营学的书，徐光启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他在天津经营了1500~2000亩土地，雇用佃农耕种。《农政全书》除了征引已有的农业文献，还介绍了西方水利技术，此外更多为徐光启本人农业经营实践的总结，是在地主租佃制度下探讨农业生产与多种经营相互关系以及如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专业性著作。从上述可以认识到，微观经济组织的行为是调整和盘活经济存量、优化资源配置的底层逻辑。当前我们探讨如何统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汲取中国古代经济实践的智慧，重视企业和微观组织行为的创新性，使之牵引财政和

①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周绍刚译，重庆出版社，2021年。

② 赵靖：《中国经济思想史述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8页。

金融在宏观上实现做优增量、调整存量和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第五，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是人口大国面临的突出问题。经济质量是综合国力的核心标志，但没有经济总量的提升也难以提升经济质量，更难以解决广泛的民生问题。在现代经济中，经济质量是以产业结构高端化、产品附加值高为标志的，中国经济体量大但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高中低端的产业都有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如果只片面强调发展高端产业而忽视中低端产业，就难以做大经济总量。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提高经济质量是以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或提高粮食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为标志的，而提高经济总量的主要途径则是扩大耕地面积。在粮棉争地、粮油争地的矛盾下，发展粮食谷物生产以扩大经济总量是长期存在的国计民生问题。中国很早就是世界上的人口大国，据统计，北宋初年（公元976年），北宋王朝辖区（不包括我国少数民族政权辖区）的户数达到309万户，估算人口大约1500万，耕地面积为2.953亿亩；到北宋末期（公元1110年），即经过130多年后，户数达到2088万户，估算人口约1亿，耕地面积约5亿亩。^①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北宋通过推广占城稻种植，粮食的单位产量有很大提高，从平均19亩耕地养活一个人，提高到只需要5亩耕地养活一个人，经济质量大幅提高，同时耕地面积也增加了将近70%，粮食生产总量空前增长。因此，支撑北宋王朝经济繁荣的因素既有经济质量的提升，也有经济总量的扩大。在中国引进推广南美的玉米、马铃薯、番薯的粮食生产革命时期，公元1571年中国人口约为6254万，耕地面积约为4.677亿亩，到1766年，人口增长到2.08亿，耕地面积也达到7.41亿亩，人均占有耕地从7.48亩下降到3.56亩。^②到1887年，人口增长到3.77亿，耕地面积达到9.1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2.41亩。^③农业经济总量的扩大，是通过人口从稠密地区向地广人稀地区迁移并不断开发耕地来实现的。据统计，1700年，河南、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七省区的耕地面积为64116.1平方千米，随着人口迁移和耕地开发，1850年达到79341.2平方千米，150年间增长了24%；而在农业经济发达的长江流域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开发耕地、扩大农业经济总量一直是长期趋势，从1661年到1812年，沪宁、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七省区的耕地面积

① 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和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页、第8页统计数字修正估算。

② 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和田赋统计》，1980年，第10页。

③ 同上。

从 2047.5 万公顷增加到 4340.9 万公顷，151 年间增长了 112%。^① 自秦汉以来，历代的边疆屯垦都既是经略边疆、经营周边的国家安全大政，也是扩大农业经济总量、解决人口增长民生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特别是 1757 年清政府收复新疆之后，制定了一系列组织人口迁移到新疆屯垦的优惠措施，掀起大规模屯垦戍边的热潮，伊犁和乌鲁木齐是当时两大屯垦中心。收复之初，全疆仅有 30 多万人口，到 1840 年，仅北疆地区的农业人口就已达 30 多万人，屯田面积达到 20 万公顷。之后屯田也延伸至南疆，到 1911 年辛亥革命时，新疆耕地达到 70.3 万公顷。^② 由上述可见，中华文明发展史说明，人口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必然要求既提升经济质量，又扩大经济总量。针对中国人口增长快于耕地增长的现象，18 世纪末期中国经济思想界出现了洪亮吉的人口论，洪亮吉提出了“君相调剂法”，即政府的调控措施，除了减赋税、抑兼并、赈灾害之外，还应“使野无闲田，民无剩力，疆土之新辟者，移种民以居之”。^③ 现言之，就是充分利用资源、扩大经济规模来应对人口增长的需求。

四、结 语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实践，孕育了丰富的经济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根脉和文脉。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最新实践，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分所形成的创新理论。它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从中国实践的最新发展出发，提出了新思想、新观点、新理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光辉灯塔。

(责任编辑：高 媛)

① 任继周主编：《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年，第 239～240 页、第 457 页。

② 同上，第 317 页。

③ (清)洪亮吉：《洪亮吉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5 页。

Abstracts and Keywords

The Principles of the “Five Coordinations” and “Two Integrations” in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Economy

Pei Changhong Peng Lei

Abstract: Managing and regula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a vital component in exploring the laws governing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ractice of advan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continuously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governing economic work.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Fi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at is, we must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between aggregate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foster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upgrading old ones, between optimizing allocation of new resources and making the best use of existing ones, and between enhancing quality and expanding total output. The idea of conducting coordinated planning and taking all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represents a summary and refinement of the CPC’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economic operation in the course of realiz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China.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Economy marks a new development in adapting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principle of coordinated planning and comprehensive consideration has been a consistent economic guideline upheld by the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rinciple is clearly reflected both in the overall trajectory of socialist development a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lso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source for the adaption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 China has accumulated ric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formed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nsights in major economic relationships—such a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n efficient market and a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between aggregate supply and demand, between fostering new growth drivers and upgrading old ones, between optimizing allocation of new resources and making the best use of existing ones, and between enhancing quality and expanding total output. These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form the national and cultural roots of the adaption of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Economy, “Five coordinations”, integrate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realities and the best of its traditional culture